



1-9

清華大學與中國現代詞學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Modern *Ci* Poetry Studies

陳水雲 (Chen Shuiyun) *

清華大學是近現代教育史上最著名的高等學府，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創造了許多奇蹟。在人文學科方面，以 1924 年開設的國學研究院對後世影響極大，它為現代中國學術界培養了一大批「志在學術」的文化精英，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的兩位——王國維、梁啟超，更是影響到近現代詞學史發展走向的學術大師，他們的學術興趣和治學方法也影響著在研究院學習的學生們，其中儲皖峰、姜亮夫，特別是趙萬里等在詞學研究上的建樹尤其突出。在 3、40 年代的清華大學，從事詞學研究的有俞平伯、浦江清、蕭滌非，他們把在他校接受的教育思想與清華的詞學觀念相會通，使得清華成為民國時期詞學研究較有影響的一大重鎮。

一、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詞學承傳

清華大學原為隸屬於外交部的清華學校，是一所培訓留美學生的預備學堂。1924 年秋，校長曹雲祥計劃籌建大學部及研究院，1925 年春，在胡適的謀劃和幫助下，學校先後聘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研究院導師，吳宓為研究院主任，李濟為專任講師，陸維釗（陸不久以事辭，由趙萬里補其缺）、梁廷燦、章明煌三人為助教，這就是後來所說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成員構成的基本情況。研究院先後招有四屆學生，共 72

人，這些學生後來在高等院校任教的約有 50 餘人，並成為 3、40 年代中國南北各大學的學術精英和骨幹。

研究院的兩位導師——王國維和梁啟超，他們對於詞學都是有精深研究的。這時王國維主要學術領域是經史之學，但他在十七、八年前已在《國粹學報》上刊有《人間詞話》，在研究院任教期間也不是完全不談詞曲的，據姜亮夫回憶他曾填詞一首，王國維居然花了兩個多小時幫他修改，¹徐中舒也回憶說王國維曾在學生面前誦讀過辛棄疾《摸魚兒》、《賀新郎》二詞。²1925 年樸社計劃出版由俞平伯校點的《人間詞話》單行本，並請王國維的老鄉及好友陳乃乾與他聯繫，王國維對於這件事是這樣回答的：「《人間詞話》乃第十四、五年前之作，當時曾刊登《國粹學報》，與鄧君如何約束，弟已忘卻，現在翻印，鄧君想未必有他言。但此書弟亦無底稿，不知其中所言如何，請將原本寄來一閱，或有所刪定，再行付印，如何？」³這封信寫在 8 月 29 日，提到《人間詞話》的版權問題，也談到自己記不清這部作品的具體內容及觀點，大約是看到陳乃乾寄來的《國粹學報》原本及俞平伯的校點本後，接著在 9 月 18 日給陳乃乾回信說：「《詞話》有訛字，已改正，茲行寄上，請察收。」⁴對於這部 1926 年在北京印行的《人間詞話》，他的學生及同事應該說是比較熟悉和瞭解的，後來浦江清撰寫〈王靜庵先生之文學批評〉和戴家祥撰寫〈海甯

* 作者現為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1 姜亮夫，〈憶清華國學院〉，《學術集林》初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頁 232-245。

2 徐中舒，〈追憶王靜安先生〉，《文學週報》5.1-2 (1927.8.7)：78-82。

3 《王國維全集·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419-420。

4 《王國維全集·書信》，頁 422。

王國維先生：近代學術代表人物講稿之四），還專門談到《人間詞話》並較為全面地評述了其中的主要觀點，也就是說《人間詞話》的主要觀點對研究院的年輕學者是有影響的。至於「四大導師」的另一位——梁啟超，在任教清華研究院期間，正是其填詞之興再起的時候，據《梁啟超年譜長編》，1925年6、7月間，「先生頗好作詞，一月中所成甚多」，曾致書林志鈞說：「日來頗為小詞自遣，曾用便箋寫數闕，付以新式符號，由季常轉致，想已收到，乞賜評駁。」又致書其弟梁啟勳說：「近忽發詞興，除昨寄之思莊手卷外，更有數首，別紙寫呈。」「追憶成容若詞，寫上近詞，皆學《樵歌》，此間可辟出新國土地，但長調較難下手耳。」又將其所作寄示胡適指正，並談到自己對詩詞用韻問題的看法：「雖不敢說無韻的詩絕對不能成立，但終覺其不能移我情。韻固不必拘定什麼《佩文齋詩韻》、《詞林正韻》等，但取用普通話念去合腔好。」他還向梁啟勳極力推薦朱祖謀的《彊村叢書》，指出「弟有意學詞，不可不置一部」，⁵期間還致力於詞籍目錄及校勘的工作，先後撰有《靜春詞跋》、《跋程正伯書舟詞》、《吳夢窗年齒與姜石帚》、《記蘭畹集》、《記時賢本事曲子詞集》等，編寫有《中國圖書大辭典》集部「唐宋元人詞集目錄」（約1萬5千字），其門生謝國楨對此事也有這樣的記載：「先生近三年著述……於詞家專集，則有詞人及詞集之考證，用考證之法治詞家之集，考訂尤詳。」⁶課間，他還應《清華週刊》之約，撰有《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其中韻文書類有《清真詞》、《醉翁琴操》、《東坡樂府》、《屯田集》、《淮海詞》、《樵歌》、《稼軒詞》、《後村集》、《石道人歌曲》、《碧山詞》、《夢窗詞》、《飲水詞》、《樵風樂府》等詞集。當然，這一時期，他投入心力最多的是辛棄疾年譜的編寫，儲皖峰正是承師囑而成《辛詞校注》一書，他後來深情地回憶起當日受教之情形：「民國十六年，在清華常與先生讀辛詞，時先生方搜輯材料，欲為辛編制年譜。十七年孟秋，先生成文兩篇：一《跋四卷本稼軒詞》，二《跋稼軒集外詞》，比即出以相示，並謂能據

此補編詞，亦屬快事。峰受而諾之。是年冬，先生臥疾於北平協和醫院，峰每往省視，先生輒以此為問。以人事遷延，至十八冬，勉成《辛詞校注》一書，惜先生已不及見矣。」⁷

在王國維、梁啟超的影響和指導下，研究院「學子」在詞學方面亦頗有建樹，其成就較為突出者為儲皖峰、姜亮夫、趙萬里等。儲皖峰（1896-1942），字逸安，安徽潛山人。1923年夏，師範學校畢業後，考入上海南方大學，後為北京大學旁聽生，曾問學於胡適、陳垣、馬叔平等知名學者。1927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並參加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活動，與陸侃如、謝國楨、姚名達等創辦述學社，編印《國學月報》，發表有關中國文學史專題研究的文章。1928年夏，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先後在中國公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北平大學、輔仁大學任教，繼續從事中國文學史的研究，1942年2月6日病卒於北京。儲皖峰的詞學研究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對宋代詞人柳永、楊萬里生平的考證，二是關於歐陽修《憶江南》詞的考證及其演變的考察，三是對宋代愛國詞人辛棄疾《稼軒詞》的校注，以及對清代女詞人顧太清《天遊閣集》的校補。趙萬里（1905-1980），字斐雲，別號芸龕、舜龕，浙江海寧人。1921年考入東南大學中文系，從吳梅習詞學。1925年畢業後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助教，在文史、戲曲、金石、版本、目錄、校勘等方面都得到過王國維的具體指導，1928年轉往北海圖書館工作，歷任中文採訪組組長、善本考訂組組長、編纂委員、善本部主任，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及通訊研究員，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和文獻館專門委員，並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法大學、輔仁大學等校兼職任教，講授中國史料目錄學、目錄學、校勘學、版本學、中國雕版史、中國戲曲史、中國俗文學史、詞史等課程。他的學術專長主要在版本、目錄、校勘上，在王國維去世後，他先後輯撰有《王國維先生著述目錄》、《王國維先生手批手校書目》、《〈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王靜庵先生年譜》等，最值得一提的

5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553-577。

6 《論七略別錄與七略跋》，天津《益世報》1929年3月5日。

7 《跋稼軒集外詞識語》，《詞學季刊》1.2（1933）：112。

是，從 1927 年至 1930 年間曾校輯宋金元詞籍為《校輯宋金元人詞》，1931 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排印出版，這是一部收詞人七十家、詞作 15,000 餘首、多達 73 卷的宋金元詞的匯輯。「他給宋金元詞整理出這許多的新史料來，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都應該對他表示深厚的感謝和敬禮。」⁸ 姜亮夫（1902-1995），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雲南昆明人。1921 年入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1926 年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從 1928 年起先是執教於南通中學、無錫中學，後任大夏大學、濟南大學、復旦大學教授及北新書局編輯。1935 年赴法國巴黎進修，期間抄閱了大量的敦煌經卷，為挽回大量流失海外的珍貴文獻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氣力。1937 年經莫斯科回國，先後任職東北大學教授、英士大學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雲南大學教授兼文法學院院長。姜亮夫的學術成就主要在楚辭學、敦煌學和古文字學，但在 3、40 年代也曾在詞學方面下過很大的功夫，曾發表有〈「詞」的原始與形成〉論文，為張惠言《詞選》作過箋注的工作，1933 年出版的《文學概論講述》一書則談到詞的體制、韻律、流變等問題，這三個方面大致反映了他在詞學方面的見解和方法。

二、研究院「弟子」詞學的「新」與「舊」

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種研究機構，它的目標是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通才，「以學問道義相期」，「治學與做人並重」，因此，它在人才培養方法上特別注重對學生研究能力的訓練：「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⁹ 姜亮夫曾對國學院幾位導師的研究方法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描述：「梁任公先生從多方面多角度對先秦古籍來一個全面系統總結，講課中他從校勘、考證、訓詁以及學術系統來分析書的真偽及其年

代，而又隨時總結某一問題，總結時經常拿幾種書來比較，因此我對古書全貌大體瞭解了，問題也知道了，整理古書方法也知道。……王（國維）先生做學問有一個特點：他要解決一個問題，先要把有關這問題的所有材料齊全，才下第一步結論，把結論再和有關問題打通一下，看一看，然後才對此字下結論。……陳寅恪先生的最大特點：每一種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導……他的比較研究規模很大，例如新舊唐書的比較，有的地方令人拍案稱奇。」¹⁰ 這裏既有王國維的考證歸納，也有梁啟超的寬廣視野，還有陳寅恪的比較方法，這些方法對於國學研究院的弟子可謂沾溉深遠，使他們的詞學研究方法實現了傳統考據與現代闡釋的會通和融合。

（一）詞人詞調考證

這是一種比較傳統的研究方法，像儲皖峰對柳永、楊萬里生平的考證和對歐陽修《憶江南》詞的考證即為此類。在〈柳永生卒考〉一文中，儲皖峰根據宋代筆記和柳永的作品，推斷：柳永與張先齊名，年齡應該與其相近；較晏殊為後進，年齡不會大過晏殊；又與蘇軾猶及同時，可能比蘇軾大四五十左右；又據《高齋詞話》載秦觀「從柳七學詞」一語，初步斷定柳永的死當在元豐元、二年之間；最後的結論是柳永當生在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卒在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約八十餘。這裏使用的考證方法有內證法（通過柳永作品的分析證明之），也有外證法（通過宋代的筆記史料相關記載來分析辨明之）。〈楊萬里的生卒年月〉一文，是在陳垣的指導和胡適的幫助下完成的，他從《宋史》「儒林傳」的記載出發，以楊萬里的《誠齋集》之〈答虞祖禹書〉、〈羅仲謀墓誌銘〉、〈浩齋記〉等為內證，證明楊萬里當生於建炎元年（1126）而非《宋史》所載之宣和六年，又據楊萬里之子楊長孺〈諡文節公告議〉一文推斷其卒年當在開禧二年（1206）享年八十而非《宋史》本傳所說享年八十三。這篇文章主要是用內證法或近證法來辨識《宋史》的誤載，這一結論在後來也多為治宋代文

8 胡適，〈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序〉，《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 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清華週刊》351: 1-2。

10 同註 1。

史者所徵引和采信。關於歐陽修《憶江南》詞，據王銍《默記》載，時有「歐公盜甥」之說，並舉《憶江南》詞為證，但作者卻予以回駁，認為「此詞不可信也」。而儲皖峰卻認為確有其事，他以歐陽修作品大量詠柳詞的存在，還有〈神宗實錄本傳〉、〈神宗舊史本傳〉、歐陽修〈滁州謝上表〉的記載，證明《憶江南》詞中的「柳」應該指的就是其甥「張氏」，還有通過歐陽修作品中情感的表達，也很能看出歐陽修是一個「天生情種」，「歐公盜甥」之說亦未必是空穴來風。當然，儲皖峰之說也只是一家之言，現代著名詞學家夏承燾先生說：「詞人綺語，攻擊者乃資為口實；《醉翁琴趣》中豔體若《江南柳》者尚多，吾人讀歐詞，固不致信以為真也。」¹¹則所持的又是一種看法，但他倒不是出於回護歐公形象的道學立場，而主要是著眼在對詞的體性立場立論，具有比較鮮明的現代學術色彩。

（二）詞籍輯佚校勘

校勘輯佚之學是乾嘉學派對中國學術的重大貢獻，到晚清王鵬運、朱祖謀又將之移植到詞學領域，並在校勘《夢窗四稿》、《東坡樂府》、《彊村叢書》等方面取得舉世公認的業績。王國維在這方面的重要成就也有《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每輯之後附以跋語，對作者姓氏里籍、出處仕履、版本源流、作品真偽、文字衍奪等均詳加稽考，¹²這一點對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是有深刻影響的。趙萬里自稱校輯宋金元人詞，意在補毛氏、王氏、江氏、朱氏、吳氏諸家之遺，凡諸家所據本未足「均重加校錄」，「以補苴前人所刻者」，還因此將宋元人所著說部、別集翻閱殆遍，凡得宋詞別集 56 家、金別集 2 家、元別集 7 家、總集二種、宋人詞話三種，另宋金元名家詞補遺一種，共收詞

人 70 家，詞作 15,000 餘首。這個輯本最大特點是體例的創新和方法的嚴謹：「以調之長短為次，每首後注所出，以書之時代為次。正文依時代最先者，而以成書在後者所引校之。有異文則夾註於行間，可以規諸書因襲之跡。……凡贗作或前人誤題，悉入卷後附錄，低一格書之，並詳為疏證，以免無徵不信。」¹³正因為這樣，胡適稱其長處「在方法和體例的謹嚴」，¹⁴龍榆生稱其「謹嚴縝密，遠勝劉書」（指劉毓盤《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¹⁵唐圭璋先生稱其「搜采既富，校訂也精」，「精審突過前賢」。¹⁶此外，儲皖峰對顧太清《天遊閣集》的整理亦值得一提，他將日本內藤炳南的《天遊閣集》鈔本與西泠印社本《東海漁歌》相比勘，發現較之西泠印社本《東海漁歌》多了卷 2、卷 5、卷 6 三部分內容，並指出刻本卷 3、卷 4 也較之鈔本少了部分作品，對日本鈔本的披露可謂是對顧太清詞集作了一個全面的介紹，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著名滿學家金啓琮先生才從日本借得鈔本由遼寧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¹⁷

（三）作品校注箋釋

主要有儲皖峰《辛詞校注》和姜亮夫《詞選箋注》、陸侃如《詞選箋注》，前者為個人別集，後者為選集總集，但《辛詞校注》一書只見儲皖峰自己提及，未見刻本傳世，姜氏和陸氏的《詞選箋注》一書都是對張惠言所編《詞選》的注釋，陸氏的箋注本今已不見（大約完成在 1925 年），姜氏箋注本由上海北新書局 1934 年 6 月出版。對唐宋詞集的注釋在這之前也有一些，如胡鳴盛《韋莊詞注》、葉紹鈞《蘇辛詞》、《周姜詞》、夏敬觀《二晏詞》等，但姜氏《詞選箋注》一書也有其特色，在體例上對每一位詞人有介紹和總評，對每一首詞作則由題解、本事、詞評、箋注組成，作者是詳其里居、生平、

11 夏承燾，〈四庫全書詞籍提要校議〉，《唐宋詞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 212-237。

12 劉石，〈二十世紀詞籍匯刊敘錄〉，《有高樓綴稿》（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40。

13 趙萬里，〈例言〉，《校輯宋金元人詞》（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頁 3。

14 胡適，《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頁 588。

15 龍榆生，〈唐宋金元詞鈞沉序〉，周泳先，《唐宋金元詞鈞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1-2。

16 唐圭璋，〈我的學詞經歷〉，《文史知識》1985.2：3-6。

17 姜亮夫，《詞選箋注》，《姜亮夫全集》第 21 冊（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410。

著述；題解主要是解說詞調，本事是徵引關於這首作品的背景材料，詞評則是詞學史上著名詞評家對這首詞的分析和評價，箋注是對作品中疑難字句用典作字義上的疏通或校勘，這樣的體例不但有助於對詞人有一個全面地瞭解，而且更有助於初學者加深對作品意蘊的把握。姜亮夫談到他箋注《詞選》是爲了幫助初學者之「理會」，力避厲箋《絕妙好詞》的「抄撮遺聞，支言漫衍」。

不過，國學院弟子治詞並非全是傳統實證性的考證、校勘、箋注，也有用現代闡釋性方法對詞體及詞史作宏觀性研究的成果，這一點比較具體地體現在姜亮夫〈詞選箋注自序〉和《文學概論講述》對詞體的論述上。在《文學概論講述》第二編「中國文學各論之部」設有一章專門談「詞」，分五節：詞總說、詞史、詞體、詞律、概說。在「總說」部分，談到「詞」的定義，釐清詞與詩餘、詞與長短句的涵義以及詞與詩與曲的異同等；在「詞史」部分，談到「詞」的起源及其如何「完形」的發展進程；在「詞體」部分，指出以句式長短作爲劃分依據並不合理，強調要從音樂詞調的角度上去劃分，即，第一類是由本詞而稍加變化，不另成新調者；第二類是集許多調子採擇其一部分加以組合而另成新調者，具體說來有令、近、引、慢、犯等；在「詞律」部分，著重談到音律、四聲、韻；在「概說」部分，重點談到詞是怎樣從自然階段走向文人階段的，分析了詞祖溫庭筠、小令的李煜、慢詞的柳永等著名詞人的代表作品。其中，「總說」、「詞史」、「概說」有較強的理論色彩，也表明了姜亮夫這樣一種詞史觀：從初萌到晚唐溫庭筠，詞已算定型完成，再經過五代到北宋，便算是盡態極妍，依然保持著自然、天然、爛漫之美，或如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岸曉風殘月」，或如關東大漢歌「大江東去」。到南宋以後的詞，卻成了不可救藥的已入膏肓之病，最後是元人起來「砭膏肓起廢疾」了。至於明以後的作家，雖然在量上多過宋人，而實質方面卻都是些寶典裝成脂粉襲人的錦簇，很少不假修飾的天生麗質了。在〈詞選箋注自序〉裏亦有類似表述，首先他批評了長

期以來流行卑視詞體的觀點，從文學貴於創造而不貴於因襲的角度，論證了詞作爲兩宋之時代文學的價值所在。然後重點描述了五代兩宋詞發展之大勢——五代爲初期，新生茁發時也；北宋爲中期，壯大敷與時也；南宋爲末期，衰敝修補時也。其中，對南北兩宋詞的審美特徵的分析尤爲精闢，即北宋：外形上：已有制題，慢詞起於蘇柳，作者喜易新奇調名，漸不守詞律。內容上：不全爲綺語，寫事寫物，談理談玄，無所不可，漸臻於複雜之境。境界上：雖無五代之空靈幽邃，而自然唐大，即在小調，亦多壯語。南宋：1. 重代字；2. 拘於聲律而忘內容；3. 多詠物以寄意；4. 多用典故。最後，姜亮夫對兩宋詞史有一段概述性描寫：「大抵五代開其緒，詞人之詞；北宋吐其豔，詩人之詞；至於南宋，則秋風落木，已是衰落。倘亦胡適所謂『詞匠』者歟？」¹⁸ 這樣的觀點很顯然是從王國維到胡適而來的歷史進化論觀點，同時也對南北宋詞的不同審美特點作了比較合理的概括。

三、3、40年代的清華詞學：蕭滌非、俞平伯、浦江清

3、40年代的清華大學，已是享譽中外的著名學府，1941年梅貽琦引用美國大學一封來函的讚語說：「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¹⁹ 清華學者中蕭滌非在20年代末即以治詞學嶄露頭角，發表有〈讀詞星語〉的論詞劄記，得到著名學者楊振聲的稱讚，並對詞的起源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隨後二十年間，清華講壇傳授詞學的是俞平伯（30年代北平清華大學時期）和浦江清（40年代西南聯大時期），前者撰有《讀詞偶得》、《清真詞釋》，後者有由課堂講稿而來的《詞的講解》，這三部作品都是對文本意義和章法的解讀，因此被當代學者曾大興稱爲詞的鑒賞之學，也就是說詞的鑒賞之學是3、40年代清華詞學研究的一大特色。

蕭滌非（1906-1991），原名忠臨，江西臨川人。1920年考入開封留美預備學校，1926年考入清華大學中

18 姜亮夫，〈詞選箋注自序〉，《姜亮夫全集》第21冊。

19 梅貽琦，〈抗戰期中之清華〉，《教育通訊》4: 19（1941）：15-16。

文系，1933年在清華研究院畢業後，到山東大學任教，開設「詞選」課程，抗戰期間在西南聯大任教，1947年返回山東大學。在清華研究院學習期間，蕭滌非撰寫的〈讀詞星語〉，發表在《清華週刊》第32卷第2期，前有「小引」談到自己的寫作動機：

余年來致力於詞，居恒欲取一二專集為之注釋，而時間精力，兩病未能，然以涉獵所及，要亦不無所得，其於詞中佳句之出處，頗有為前人所未發，亦間有與舊說相補正者，零星斷錦，原無關乎宏旨，而對此難助者，又不忍遽棄捐，爰為錄出，略以作家時代之先後為次，聊以供同好者之談助與賞鑒耳。

這篇讀詞劄記主要是抉發唐宋詞中名篇名句的出處，特別是對詩句的點染化用，故開篇第一段講到詩詞之分界的問題，指出：「詩詞二者，俱各有其本色語，一相混雜，必無是處，故盡有巧語，在詩則寂然無聞，入詞則流膾人口者……詞家之翻詩語，蓋即取其近於詞者，並非漫無抉擇。且其點染變化之間，語氣之輕重，造句之巧拙，亦各有別。要皆自然而然，故仍不失為佳句。」然後依時代順序談到李煜、韋莊、馮延巳、李珣、鹿虔扈、晏殊、晏幾道、柳永、張先、歐陽修、蘇軾、秦觀、黃庭堅、孫洙、趙令時、陳與義、周美成、李清照、辛棄疾、趙彥端、吳文英、蔣捷、馬莊父、康與之、張炎、王國維 26 家作品之用語及出處，其中有些地方頗能揭示某些詞人在措辭造語上的特點，如謂「李後主多以俗語白話入詞」，「東坡好多集名及隱括前人詩文入詞」、「美成以善於融化詩句見稱，然亦有化全首者」、「易安造語最工，如『寵柳嬌花』、『綠肥紅瘦』，皆極新奇」等等。最可玩味者，是作者對周邦彥的分析，頗能見出他對清真詞的推崇之意：「美成集北宋之大成，其詞於結語，尤多以拙語取勝，視北宋諸家為尤甚，此實其詞之一大特點也。」（美成）詞中所言，大抵不外男女相思離別悲歡之作，綺辭豔語，在所不免，而後人不察，遂群以風格為周詞詬病，幾于異日同聲一孔出氣，此不獨不足以知美成，亦不足與言文學也。……夫文學

所貴，惟在真實，男女起居，大欲所存，周詞固多豔語，要不失為實錄，非必思君懷國，而後可為君子之詞也。『瓊樓玉宇』，固是好詞；『曉風殘月』，又何嘗不是好詞？夫以道學觀念，雜入文學處已無有是處。況以之言詞耶？」這一段從文學「真實」論出發，批評了道學之士對周邦彥的指斥之辭，還原了周邦彥作為一位言情聖手的詞人身份。此外，蕭滌非還談到對填詞問題的一些看法，比如說：「蕙風論詞，特標重拙大三者，余以為重大猶可，惟拙為難，蓋拙語純出白描，別具天趣，不可力學而致也。自北宋而下，已無此種境界，由疏而細密，固亦文學演進必然之公例，周保緒乃謂『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至北宋涵渾之詣』，夫豈知言哉？」便是從文學發展進化的立場，對南宋詞給予肯定，批評了周濟尊北抑南的常州派觀念。

如果說蕭滌非所論比較偏重於詞的字義句法的話，那麼俞平伯的論詞已向字義、句法、章法等方面作全方位的評賞了。俞平伯（1900-1990），原名銘衡，字直民，後改名平伯，浙江德清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曾在黃侃指導下研習《清真集》：「（黃季剛）從周濟《詞辨》選錄凡二十二首，稱為《詞辨選》，講義至今尚存。季師盛稱周氏選錄之精，又推薦各書……目雖至簡，而的當難改，可謂要言不煩。讀者若寢饋於此數書中，欲為詞家已綽有餘裕。」²⁰這時他論詞是受到常州派比興寄託觀念影響的，但也為他後來致力於清真詞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不過，俞平伯受胡適的思想影響更大，他不但撰文回應胡適「文學革命」的主張，而且也接受了胡適在《詞選》、《詞的起源》、《國語文學史》中所宣導的詞學觀念，認為白話詞是中國詞史發展的主流，唐宋詞就是中國文學發展到唐宋的白話文學，在1926年還應北京樸社之邀整理校點過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他應該是第一個主動傳播從王國維到胡適等現代派詞學觀念的人。1928年10月，他應北大校友清華校長羅家倫之邀，到清華大學講授《南唐二主詞》、《清真詞》等課程，還編有《詞課示例》一書，選已作14首以供學生揣摩學習，《讀詞偶得》（1934）、《清真詞釋》（1948）即是他在清華課堂授課講稿的基礎上整理出來的，先後

20 俞平伯，〈清真詞釋〉，《論詩詞曲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578。

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他對詞的講解是帶有很強烈的現代派色彩的。

誠如有的學者所言，俞平伯是現代詞學史上第一個建構詩詞鑒賞之學的學者。在《讀詞偶得》、《清真詞釋》之前，他便撰有〈葦芷繚衡室劄記一則：宋詞三首賞析〉一文，對晏幾道《臨江仙》、周邦彥《蝶戀花》、柳永《八聲甘州》作了初步的評賞，也可以說這是俞平伯進行詩詞鑒賞之學建設的第一步嘗試，到他在清華大學講授《詞選》，便把這一努力做了比較全面的發展，並因此有了〈讀詞偶得〉、〈清真詞釋〉這樣的成果。當代學者曾大興曾將俞平伯的詩詞鑒賞的內容概括為三點：一溯源、二結構分析、三文詞欣賞，「這種鑒賞，既吸收新學的某些觀點和方法，又吸收了傳統詞學的某些成果，然後用淺近的文言表出，予人以散文詩一樣的美感」，並指出他的鑒賞側重在結構分析，《讀詞偶得》和《清真詞釋》幾乎每篇都講結構，對於文詞的講解則涉及到格律、色彩、煉字、句法、對偶、詞眼、風格、意境等方方面面。²¹ 值得注意的是，俞平伯在上述詩詞評賞的基礎上，還提煉出一套關於詩詞評賞的理論和方法，這就是，他反對常州派支離破碎的解詞法而主張從整體把握文本之意義。他談溫庭筠《菩薩蠻》時指出，儘管張惠言、譚獻兩家說得活靈活現，「此感士不遇，篇法彷彿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但他「卻終不敢苟同」，這是不滿常州派求義過深。又在分析韋莊《菩薩蠻》五首時說，「韋氏此詞凡五首，實一篇之五節耳，而選每割裂之；如張氏《詞選》、周氏《詞辨》、成氏《唐五代詞選》，均去其『勸君今夜須沉醉』一首」，張氏的錯誤就在於他「先割裂之而後言篇法章法」，「此等篇法章法即便成立，是作者的呢？還是選家的呢？豈非混而不清？豈非削足適履？故任意割裂已誤，任意割裂之後再言篇章如何的神妙，乃屬誤中之誤」，²² 這是反對張氏割裂詞義之完整性。因此，他認為一首詞是一個不可分

割的整體，詞情與調情皆不可割裂而析之，如在分析李煜《清平樂》（別來春半）時說：「詞情調情之吻合，詞之至者也。後主之詞，此二者每為不可分之完整，其本原悉出於自然，不假勉強，夫勉強而求合，豈有所謂不可分之完整耶？是以知其必出於自然也。」²³ 當然，這並不是說分析就沒有必要了，反倒是對其章法結構更要做細緻深入之分析。「蓋分析文章，類名家言，不如囫圇吞耳。但太囫圇又似參禪，亦不甚好，此義法之由來也。」從某種程度上講，分析與製作是一種相反相承的存在：「製作本也，片言居要；分析末也，多言少中；故勞佚之情殊也。」「解析者，創作之顛倒也，顛倒衣裳，倒顛衣裳，一化為多，將繁喻簡也。」「尚簡奈何又貴多？《記》不云乎？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²⁴ 那麼，在把握整體的前提下如何進行鑒賞呢？俞平伯提出了「深思」和「淺嘗」的兩種方法，何謂「深思」？何謂「淺嘗」？「淺嘗」意在求其「真」，「深思」意在求其「美」。「真者，其本來之固然；美者，其引申假借之或然也。夫淺嘗而得其固然，斯無間然矣；若深思而求其或然，則正是俗語所謂鑽到牛角尖裏去，吾未見其如何而有合也。作者亦有此意否？若固有之，雖洞極深微奧窔，亦無所謂深求也。若本無而實以有，深則深矣，奈實非何？……然必謂文詞之意窮於作者之意中，又安得為知類通方乎？赤水玄珠得之象罔，文章之出於意匠慘澹經營中者固系常情，而其若有神助者，亦非例外。迷離恍惚之間，顛倒夢想之例，或向晚支頤，或挑燈擁髻，其逸興遄飛，其文如之，則如野雲孤飛矣！其深情之搖盪也，其文又如之，則如綠波之搖盪矣！亦有意乎？亦無意乎？安見其可淺嘗而不可深思乎？又安可見其淺嘗之之得多於深思之之得乎？安見其淺嘗則是而深思者乎？」²⁵ 這裏所說「深思」和「淺嘗」，實際上是講對文本意義的追尋有兩個方向：求「真」和求「美」，求真亦即求作者之意，

21 曾大興，〈俞平伯先生與詞的鑒賞之學〉，《長江學術》2007.2: 49-54。

22 俞平伯，〈讀詞偶得〉，《論詩詞曲雜著》，頁 508。

23 同註 27，頁 524。

24 俞平伯，〈清真詞釋〉，《論詩詞曲雜著》，頁 602-604。

25 俞平伯，〈積木詞序〉，《論詩詞曲雜著》，頁 689。

求美亦即求讀者之意，前者是文本所固有的（「固然」），後者是讀者從文本的解讀過程而生成的，不同的讀者因經歷、情感、學識等的差別，對文本的解讀自然會呈現出歧義性的特點（「或然」），在俞平伯看來文詞之意有的是「作者之意」的原文複製，有的則是作者「即興成文」之作，完全依靠讀者自己的感悟力去把握它的意義真諦，因此，「深思」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在俞平伯之後，接過清華詞學講席的是浦江清。其實，在北平清華的七、八年間，他們一直是關係比較密切的朋友和同事，兩人對詞曲都有著一樣的興趣和愛好，不僅都會吟詞唱曲，而且還有時同臺表演。浦江清（1904-1957），上海松江人。1926年畢業於東南大學，經吳宓推薦，入清華國學研究院，為陳寅恪的助教，1928年清華改制為大學，他隨陳寅恪一起轉入中國文學系，1937年又隨清華大學師生一起南遷昆明，在西南聯大教授中國文學系詞曲課程，《詞的講解》一稿就是他在西南聯大講授詞選課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的。該稿由對李白《菩薩蠻》、《憶秦娥》和溫庭筠《菩薩蠻》十五首的賞析組成，在體例上則包括有「考證」、「講解」、「評析」等內容，與俞平伯《讀詞偶得》、《清真詞釋》相比，既有相通之處，也各有其特點，如果說俞平伯重在感性的闡發和感情的引導，那麼浦江清則比較注重嚴整的邏輯分析，「融考證、箋釋、鑒賞和評論於一體，熔西方詩學與中國傳統詩論、詞論於一爐」，²⁶特別是在作品的語辭、章法、結構的分析和理論的闡發方面頗多發人深省之處。

首先，他從詞體和詞人兩個方面，批評常州派把溫庭筠所作《菩薩蠻》強解為「感士不遇」。從詞體看，在晚唐時代，詞是新興的樂府，原是教坊及北里中的小曲，作者並不看做嚴正的文學，直到宋以後的詞家，方始特意在寄託方面用心。從詞人看，溫庭筠的《菩薩蠻》恰巧作於這個曲調最盛行於長安北里之日，也正是他「不修邊幅」，隨著「公卿家無賴子弟相與蒲飲酣醉」的時候，不曾想到要寄託什麼。其次，他也反對張惠言把溫庭筠《菩薩蠻》十四首看成一個整篇，說它在篇法

上是仿效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在浦江清看來，「這樣一個大結構的看法也是主觀的，無中生有，自陷於迷離恍惚之境」。原因有二，一則題材並非宮怨，二則十四章非通連成一大結構，此十四章實乃如十四扇美女屏風，各有各的姿態。接著，他從多個角度多個方面談到詞的一些體性特點：

- （一）認為詞人的語言用的是詩人的語言。「不過詞的最初是從宮體詩發展出來，到了兩宋的詞人雖然已把詞的境界擴大，但到底不能比詩的領域，所以詞人也只用了詩的辭彙的一部分。此外詞人又吸收了唐宋時代的俗語的質點，因為詞的體制即是摹仿唐宋時代的民間的歌曲的。」
- （二）認為詞曲多用代言體。「詞在戲曲未起以前，亦有代言之用，詞中抒情非必作者自己之情，乃代為各色人等語，其中尤以張生、鶯鶯式之才子佳人語為多，亦即男女鍾情的語言。……其與戲曲不同者，戲曲必坐實張某、李某之事，詞則但傳情調，其中若有故事之存在，但不具首尾，亦譬如繪畫，於變動不居的自然中抓住某一頃刻，亦譬如短篇小說，但說一片斷的情緒，此情緒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謂之崔、張之事亦可，謂之霍、李、陳、潘均無不可。」
- （三）認為詞是一種「純詩」。「詩詞裏面接近於原始民歌的格式的東西，其中不含有散文的質點，不含有思想的貫串和邏輯的部分，只是語言和聲音的自然連搭，只是情調的連屬，這樣的東西，我們稱之為『純詩』。……散文有散文的邏輯，詩詞有詩詞的邏輯，也可以說沒有邏輯，是拿許多別的東西來代替那邏輯的，如果以散文的理致去探索詩詞，那詩詞的句法，句與句之間距離比較遠，中間有思想的跳越。這跳越是詩詞語言的一種姿態，但絕不是無緣無故而跳，乃是詩詞裏面存在著向種因素可以幫助思想的跨越。」
- （四）探討了詩詞在句法和章法上的特點。從句法上講，詩詞與散文最大的不同就在它的跳躍性，可以不

26 曾大興，《詞學的星空：20世紀詞學名家傳》，頁14。

連而為連。「所以能夠如此的原因，是詩詞語言的連屬性不僅僅憑藉於思想因素，也有憑藉於語言本身的連屬的。」從章法上講，詩詞的章法有思想的章法和語言本身的章法兩種，其中尤以語言的章法為其特色。「語言的章法即是詩詞的格律。古詩有古詩的格律，律詩有律詩的格律，每只詞牌有每只詞牌的格律。詩詞的語言必定採取某種格律，所以詩詞是格律化的語言。」²⁷總之，浦江清通過一破一立，從語言到章法再到結構層層分析，建構了一套在西方理論指導下的詩詞鑒賞之學。

四、開放的學術陣地：學術期刊與現代詞學

清華在成立研究院之初，就把學術至上作為其努力的方向，在改制為大學後更是致力於學術研究環境的建設，除了延聘名師和培養學生外，還在學術期刊的建設上亦投入較大精力，先後創辦有《清華週刊》、《清華學報》、《清華中國文學會會刊》等重要期刊，這些刊物不但為本校師生的學術研究作了推介的工作，還吸引了一大批校外學界精英為其撰稿，校內外作者和讀者的互動也有效地促進了學術研究的繁榮，詞學研究是上述期刊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華學報》創刊於1924年，在第2期即發表胡適〈詞的起源〉一文。當時胡適撰寫該稿，曾送呈王國維，請其指正，王國維讀後回信說：「尊說表面雖似與紫陽不同，實則為紫陽說下一注解，並求其所以然之故。鄙意甚為贊同，至謂長短句不起於盛唐，以詞人方面言之，弟無異議；若就樂工方面論，則教坊實早有此種曲調，崔令欽《教坊記》可證也。」²⁸對胡適的觀點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而胡適對王國維的駁議也給予了回應，並根據相關材料對自己的觀點作了進一步的說明。這一學術話題也引起了其他清華學者的關注，他們分別撰文對這一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梁啟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詞之起源」、姜亮夫「詞的原始與形成」、蕭滌非

「論詞的起源」、浦江清「詞曲探源」等便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見解。

《清華週刊》創刊於1915年，先後不定期刊載學術論文，關於詞學方面的論文有第305期上發表的徐裕昆〈納蘭容若評傳〉和陳銓（1903-1969）〈清代第一詞家納蘭性德之略傳及其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前後其他學術期刊也刊有滕固〈納蘭容若〉、趙景深〈關於納蘭詞〉、羅慕華〈納蘭性德〉、素癡〈納蘭成德傳〉，它們一起把20世紀納蘭性德研究第一次推為學術熱點。另外，第32卷第8-10期上發表的任二北〈詞曲合併研究並概論〉，第34卷第1期上發表的朱保雄〈選讀軒詞話〉，第41卷第1期上發表的郭清寰〈從斷腸集所窺見的朱淑貞的身世及其行為〉，第41卷第3、4期上發表的李維〈詞調變名考〉和霍世休〈詞調的來歷與佛教經唱〉等，也都是20世紀30年代詞學研究的重要學術成果。

《清華中國文學會月刊》為中文系「清華中國文學會」會刊，創刊於1932年，顧問有朱自清、俞平伯、陳寅恪、浦江清、趙萬里等，在第1卷第3期刊有任二北〈常州詞派之流變與是非〉、俞平伯〈論清真荔枝香近第二有無脫誤〉、朱保雄〈讀顧羨季先生荒原詞〉三文。

從清華學術期刊發表的詞學研究論文看，不但能規20世紀3、40年代學術研究的熱點，也可以通過這些詞學論文以規20世紀最初30年間學術研究方法從重考據到尚闡釋的變化，清華的學術期刊及其所刊發的詞學論文是當時學術研究進步狀況的一個縮影。

總之，通過對清華研究機構、研究隊伍、學術期刊的考察，可以看出清華大學在詞學研究上的一些特色，即在治學方法上能做到考據與闡釋兼擅，具有融合傳統與現代於一體的學術品格，開創並建構了現代詞學史上的詩詞鑒賞之學，而清華期刊為校內外的學術交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清華大學在20世紀詞學研究史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地位的，它與北京大學、東南大學、中央大學一起成為現代詞學研究最具影響力的三所高等學府。

27 浦江清，〈詞的講解〉，《浦江清文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頁106-169。

28 胡適，《詞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340。